

□黄色

(一)

父亲的骨痛在持续加剧。我一边告诉父亲这是骨质疏松，年纪大了都这样，当然长期吃药打针也有些影响，一边又专门去问张医生有没有什么好办法。“没有，”张医生说，“除非打杜冷丁，但不至于现在就打吧，以后有你好受的呢，先忍着。”我追问了一句，以后会怎么个好受法？

“很痛，比起以后的痛，现在这点痛，不算什么。”他看了我一眼，“这么跟你说吧，除了骨头痛，到时候膀胱会出血，尿道会被血块彻底堵塞，连尿管也起不了多少作用，形成尿滞留。为了清理血块，需要把针头插进去，把血块吸出来，甚至需要专门开刀。但开刀仅仅是为了取血块，对缓解病情一点用也没有，又不得不切开。总不能看着病人活活被憋死吧。”

“是痛死的吗？”

“可以这么说，反复插尿管，清理血块，很痛，再然后就死了。”

张医生的话像一道巨大的阴影，一直悬在我心头，以至于我看父亲的目光，有种高等动物看低等动物的感觉，怜悯、残忍、爱莫能助。我和他俨然被分隔在了两个世界，彼此无法穿透，无法感同身受。但他毕竟是我的父亲啊。我查资料也查到过，父亲得了这种病，那么儿子的得病概率会比一般人群高很多；因此常感到心惊肉跳，好像父亲这是在预先给我演示一遍，一个人从生到死，究竟会遭遇什么。发生在他身上的痛感，恍然间也会漂移来到我身上，真真切切，好像我也正在遭受无休无止的折磨。

一天早晨，父亲跟我说，自来水厂附近有诊所，那里的止痛膏很灵。

“谁说的？”我问他。

“雪娟说的。”

“那个地方在哪里的？”

“那么给雪娟打个电话好了。”他拿出电话，直接在上面拨，看来对号码很熟。

“打什么电话呀，大清早打人家电话？”我说。雪娟就是立火师娘，当初，就是她鼓动我们可以放心地去找田医生。

父亲把手机收了起来。我也没把他说的当回事，一天都在外面。就当是跟往常一样，父亲大清早起来，只是为了能跟我说句话。形形色色的土方偏方多的是，我本来就不相信。晚上回家吃饭时，却看见父亲接起一个电话，说了好些时间，原来就是立火师娘打来的。一个曾经在中医院工作过的骨科医生，现在自己开了一诊所，就在自来水厂旁边的滨江西路多少号。立火师娘再三劝父亲，那里的膏药，说不定可以拿来试试呢，都说对付骨头痛很灵光。

父亲要我明天就去那个诊所一趟：“你见了那个骨科医生，要说清楚我的身体情况，骨质疏松还能不能用他的膏药。”

“好的，我会问的。”

他又补充道：“如果明天你上班事情忙，等到你后天休息下来，再去也不迟。后天去的话，我也可以一起去。”

“好的，那就后天去吧。”

(二)

我一直没去那家诊所。后来还是他自己去的，要来了那种膏药。给父亲寻医问药本该是我的事，但我似乎有些专制，对什么是医什么是药有着自己的理解，只按照自己



如父如子

中国式父子关系少有直白的表达，多是权力的暗自交锋与不肯低头的尊严，爱常常藏在对峙、沉默与隐忍之中。《花园与父亲》是一段关于疾病、死亡与代际和解的非虚构叙事，以父亲患癌至离世的真实经历为线索，在新居与坟墓之间，用一方花园承载家庭的命运羁绊与个体的精神救赎。这是一场漫长的告别，父子之间最后的对视与对话充满了不舍与温情。那些真实可触的照护日常与病中琐碎，那些无人可说的煎熬、怜悯、愤怒、恐惧与无助，照见了无数人面对至亲离去时的共同心境，也让每一个经历过的人，在阅读获得最深的理解与慰藉。

的理解，努力尽自己的一份心。反过来，如果不按自己的理解，又叫我如何尽到自己的一份心呢？我已经查阅了很多资料，到目前，我为父亲安排的都是标准的疗法，甚至连他病情发展的几个时间，也逃不出统计数据的概括。除此之外，我还能做什么呢？既然能用的医学手段都已经用上了，也用到头了，那我也只能作壁上观。

但父亲有他自己的理解，更有一份只属于他的对生的渴求，眼见得我不再东奔西走地找医生，就挖骨头动脑筋地自己想办法了。有时就直接吩咐我干这干那的，分明包含了一层意思：就不指望你想办法了，但我要你做的，你总得做到吧。有的我马上就照办了，譬如，他要我去买一根护腰带来，去买一根拐杖来，我立即去买了；有的我也会拖着不办，譬如这个人那个人推荐的这个药那个药，就听之任之，随他自己在弄了，但也不去干涉。有时他对我说话明显带有情绪，似乎在埋怨我没有用心为他想办法，口气也会生硬起来。

很多东西在堆积、浸润、蔓延，一寸寸蚕食他对活着的感知，不知不觉地便以为，这般痛苦、艰难地活着是天经地义的，但即使这般痛苦、艰难地活着，也要继续活下去。

不过很快，在各种自以为是的自救行动中，他的精力终于被消耗殆尽，脑筋也动完了，说话也软塌塌的了，似乎被凌迟到只剩一口气，再也没力气呼吸了。

天渐渐热起来，为图凉快，父亲会下到地下室去，把躺椅放在桌子和墙壁之间的狭窄通道里，斜躺在上面。在那幽暗与寂静之处，他会眯着眼睛，半天才眨一下，感觉气流从气窗进来，微弱地划过他的

身体，再从身后的门洞出去。在鼻腔前面一寸的地方，气流与他的呼吸交汇，在一呼一吸之间，会产生一个气旋——但那都是前不久的事情了。不多日，他连去地下室的十来级台阶也没勇气去走，而只能坐在客厅的书柜前面。躺椅也搬上来了，在书柜前面放着，边上放了一张骨牌凳——躺椅和骨牌凳，两样家具都是他亲手做的。他把尿袋挂在躺椅这边的扶手上，把拐杖靠在躺椅那边的扶手上。茶杯放在骨牌凳上，茶杯口上插了一根塑料吸管，那种带有红色竖条纹、在上端五分之一处可以折弯的管子。父亲现在喝水得用塑料管吸了，喝水时不用从躺椅上坐起来，那会很痛。

有一次我刚从门厅进去，父亲就拿起一个白色的塑料瓶，晃了晃，让我看。似乎他就等着我回家，就为了让我看这个白色瓶子。但是我觉得他已经晃不动手里的任何东西了，他连自己的空手也晃不动了，只是颤悠悠地把瓶子拿在手里，努力向上举着。

他说：“一样的椒盐，你去买一瓶来。”

那是个盛椒盐的瓶子，平时放在厨房抽屉里。我立即想到，他是为了跟我说这件事，提前把瓶子放在了跟前的骨牌凳上。他现在不吃鱼、不吃肉，一丝厨房味道都令他恶心，他现在吃白米粥，上面撒一点椒盐，别的都不吃。

这地方也是一个气流通道，面朝门厅，面朝花园。接近中午的时候，花园里又绿又亮，十分耀眼，风沿着花园台阶爬上来，将初夏万物生长的气息捎带进来。红叶石楠火焰般的嫩梢正在转绿，含笑花、月季花正值盛开，紫薇的枝条都伸到台阶上来，挡着走路了。小区里在

修剪绿篱，植物汁液的那股浓香，连风也吹不动它，生猛，新鲜，在空气中慢慢变干。父亲将手在身前挡了一下，好像为了遮挡从花园上空落到脸上的亮光，又好像为了在各种气味的十面埋伏中，扒拉开一个小口子。好多天他都这样躺着，有人来看他时，他会说：

“可惜这么好的房子，我是没福气享受了。”

(三)

进入六月，父亲不再像之前那样大清早起来，赶在我出门前，向我倾诉昨晚吃的苦头。他们卧室的对门就是楼上的卫生间，仅仅为了贪图进出卫生间的这点方便，他都懒得起床、懒得下楼了。当然，也懒得跟我多说什么了。说了也白说，反正你听不进去。他开始踏上一条陌生的路，孤军深入，得不到亲人和同伴的接应。有时我会给他去倒一下尿袋，那只盛着金黄液体的袋子，捧在手里一晃一晃，愣是拿捏不住，摸上去似乎还有些温热。我会突然感到一阵心慌，赶紧要把它脱手，避之而唯恐不及。他也不再每天把那副假牙套上去了，不光是晚上，连白天也不套上去，他反正吃不进东西了。他人在楼上那端，歪歪斜斜地躺在床上；假牙却遗留在楼下这端，被卸下来泡在一个不锈钢小碗里，摆在厨房水槽正对的窗台上。在一汪清水中，这个人类发明的伟大装置，看着有些变形，一层天空的亮光覆盖在上面，间杂了一丁点浮起的油花。

我会来到花园里，听凭脑海里掠过一些杂乱的、跟父亲有关的念头。读高中时，放寒假遇上大冷天，我会把父亲身上的大衣、棉帽要过来穿戴，那种被父亲体温包裹起来的厚实感，仿佛至今都还在。有初识那个男人时的拘谨感。那是我记忆所及第一次见到他，我已经会走路了，被舅舅带去车站接“爸爸”，那时我被养在外婆家。车上下来一个陌生男人，看着我不知如何是好，我也只是看着他，舅舅叫我赶紧叫“爸爸”，我这才叫了一声，“爸爸”。但在现实当中，父亲正在无可挽回地飞逝而去——花园水池里养的那些鱼，通常都是成群结队地游来游去，如果有哪条鱼独自在游了，那它准是快死了；它已经再也合不到鱼群里去了，游起来身子都摆不端正了，歪歪斜斜，却仍然竭力要游出个姿势来。用网兜去捞，一捞一个准。我会把它捞起来，扔在花园里当花肥。

我在地下室里看书——会不自觉地想象，父亲当时一个人坐在这里乘凉的感受。母亲下来了，向我来投诉父亲。她说：“他摸来摸去在找东西。我问他在找什么，他说找电话本。我说找电话本干吗，他说给黄医生打电话。我说给黄医生打电话干吗，他说要到宁波去看病。我说你怎么能这样胡思乱想啊。他说这里的医生，骨头痛也不管我，大小便无数次也不管我，我要到宁波去看病。我说你怎么能给黄医生打电话呢？你不能给黄医生打电话！”

黄医生是父亲年轻时村堂里的同年伴，后来当兵，成了一名军医，退休后定居宁波，时常回新村村堂来。村堂里谁得了什么病，都会去找他，他也很乐意帮忙，而父亲跟黄医生又特别要好。

我说：“他上次也跟我说过要去宁波看病，他要打电话，就让他打好了。”

“怎么能打电话？电话一打，宁波那边就会安排他去看病的。”母亲说。

“哪有这么灵的，他这么一说，他们就照着去做？总要先来问问我们吧。”

“反正不能打电话。后来我问他电话打了没有，他说没有。我说，你不能打电话的。他没作声。还说我良心不好。”

(四)

父亲在床上躺着——有时我会去他身边坐一会儿。但有时连坐下去的勇气也没有，而只是在床边站一会儿，居高临下看着，与他仰望的眼睛交错而过。他翻来覆去地看自己的手，努力将一只手擎在空中，手指一个个分开，并拢，再换另一只手。手指有些白，他已经好久不在太阳下干活了。有很多疤痕，右手大拇指不能完全屈伸到位，有一年在车间里被机器压了一下。有一年他的手还被电锯锯到过，血肉飞溅。有数个灰指甲，起翘、扭曲。

“夜里特别难过，比白天难过。”他说。

“夜里你都在想自己。白天跟别人说说话，想别的事情，就不会特别难过。”我说。

“是的，可是我现在白天也很难过。”

我沉默了片刻，说：“人都要走到这一步的，包括我。”

父亲关心起一件事，他去世后母亲能享受多少遗嘱补助。母亲把打听来的情况向父亲做了报告。父亲点了点头，似乎还满意。他是多么希望他将死得有意义、有价值。而从母亲的角度，从丈夫的荫庇中获得货真价实的好处，那也是她应得的。都没有虚情假意。父亲还以通常的疾仪来扶持我——在父亲的出殡队伍上，儿子得捧着遗像走在最前面，向所有人宣告：我曾有过一个父亲，他现在死了。

他狠狠地把他的告诫说出来，但声音听起来有气无力：

“你要对你妈好。如果你对你妈不好，以后我死了……不要叫你捧照片，叫你妈来捧！”

从车库下到地下室的台阶上，我踩到过一些极其细微的东西。踩上去听不到一点声音，但就是能感觉到鞋底有东西。还会被脚步经过的气流带起来，像风卷起枯叶。俯身一看，是很多折断的飞虫翅叶，黑色，轻巧，密密麻麻落了一地，在手机灯光的照射下，闪烁着细微的光泽，让人心生莫名的爱怜。上网查了一下，应该是婚飞蚁的断翅，往往在春、夏季的雨后天气巨量出现，是白蚁美好爱情的遗留物。纷飞，交配，然后回到黑暗的巢穴里繁衍后代——在即将亡父的气氛中，确定的预感交织着万分的疑惑，正好赶上这么一种奇妙的生物现象，我不由得认为，那是不是某种启示呢？

(本文摘自《花园与父亲》，内容有删节，标题为编者所加)



《花园与父亲》

黄色 著

北京贝贝特 |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